

■对 话

##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：

# 罗伟章：任何时候都要回答好“我为什么写作”

□本报记者 罗建森



罗伟章

### 日常性使共情成为可能

记 者：伟章老师好！祝贺您的中篇小说《屋檐》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。《屋檐》以“合租”为切入点，通过两代人的合租生活，细腻描绘了时代变迁中人际关系的流变。这篇小说的创作起因是什么？写作过程是什么样的？

罗伟章：我家对门，有几个年轻人合租，房东放了一把大门钥匙在我这里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有若干次，他们中的某一位，果然就忘带了钥匙，找我帮忙开门。有一次我注意到，屋子里其实是有人的，但他没敲开门。这让我有了很多联想。平时在和年轻人交往的过程中，我也发现他们的边界感特别强，思考问题的时候，“我”和“我觉得”是第一要务。想到这里，便又禁不住去思考其中的得失。《芙蓉》杂志的杨晓澜找我约稿时，我想到20多年前，曾在一篇散文中谈及当年的合租，当年与当下，两相对照，就写了这篇小说。

记 者：《屋檐》中并没有一个具象化的屋檐出现，它更多的是一种象征，是“同在屋檐下”的屋檐。为什么选择它

作为题目？

罗伟章：这个题目暗示了，首先它不是悬浮的，而是日常的、落地的，是随时需要面对的。其次，如你所说，它是一个象征，屋檐既提供庇护和安全，也构成束缚和限制；既是物理空间，也是心理界线。如何看待这件事，是否愿意在内心的居所里为自己打开一扇窗，会造就不一样的人生和社会景观。同时，就这部小说的构思而言，两代人共处同一屋檐下，如果能够彼此对话和沟通，所谓心灵隔阂、精神失语的问题，就有机会冰雪消融；对话当中也讲道理，但那些道理是从一粥一饭、可感可触的日常烟火中生发出来的，正是这种日常性，使共情成为可能。这些，都是题目所预示的。当然，一个题目不可能包含太多，或许它就是个题目而已。

记 者：从《饥饿百年》、《尘世三部曲》、《谁在敲门》《红砖楼》到《屋檐》，您的书写对象在不断发生变化，从川东北乡村延伸到城市生活，人物形象也从乡土小人物拓展到作家、教师、都市青年等群体。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？

罗伟章：说到现实，人就是最大的现实。你提到的这些人物，他们的处境

和心事，都是我熟悉的。从个体到群体，从群体到时代，个体的现实映射出社会的现实、人的现实。我没有刻意地去选择书写对象。书写对象固然重要，但能否由此及彼，发掘出时代情绪和人性幽微，才是对写作者的真正考验。

当然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选择。比如，我的很大一部分小说，都是以川东北的乡村、城镇、城乡接合部为题材。然而，当我写完《谁在敲门》和“尘世三部曲”时，我发现，我对那类题材已经没有新的认知了，再写，即使有新的故事，故事的核心多半也只是原地踏步。于是我不再写，至少暂时不写，因此有了《红砖楼》等作品。

有其不同的境遇，同时又有相同的对美与善的渴求。时代在变，但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。

### 正是因为先苦过，所以才能真正写好

记 者：“门”是您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核心意象。从“家门”“楼门”到年轻人的“房门”，它是边界、是保护，有时又是囚笼，越来越难被推开。您在创造这些不同的“门”时，有什么整体上的考量吗？

罗伟章：是的，你说得对。整体上的考量谈不上，但它的的确确构成意象。

我最轻松的时刻。那时候我只需要对自己说话。我认为最好的散文就是对自己说话的散文。后来我转向写小说，是觉得，小说可以构筑一个相对完整的世界，可以让自己的想象落地开花，里面的一砖一瓦，都由我搭建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由我说了算，那种感觉极其美妙。

写非虚构就没有这样的赏心乐事，那是一桩苦活儿。我写过两部非虚构作品，《下庄村的道路》还好，《凉山叙事》是真写得苦。或者说，也不是写的过程苦，而是落笔之前苦——大雪纷飞的时节，在崇山峻岭的凉山走几十天。这还不算什么，最苦的是深入到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，才会发现

着对社会的观察和一腔热血去写。后来觉得，我还可以在中篇里做实验，尝试多种写法。而在这方面，中篇足够宽容，它给你恰如其分的空间，让你试、让你探索。于是有了《越界》《镜城》《寂静史》，等等。《声音史》最初也是以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的。

我觉得，小说之好主要由视角和语言决定。事实上它们是一体的，好的语言不会单独存在，是认知和思想带动语言。

### 时刻检视自己的写作是否配得上文学本身

记 者：在日常生活和阅读都逐渐碎片化的当下，您觉得我们更需要什么样的小说？

罗伟章：我在不同场合说过，当下，我们更要呼唤深刻的小说。这是对碎片化阅读的一种抵抗。一方面，要以优秀的、有足够吸引力的小说去争夺读者；另一方面，像《荒原狼》《撒旦探戈》《尤利西斯》这样为探究精神生活的读者而写的小说，我们也同样需要。

有时我去网上找一本相对比较有阅读门槛的作品，结果发现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读它，而且留下了颇有见地的感想。有人说当下人不在乎精神生活，只在乎情绪和索取情绪价值。这或许是一种误解，是将局部放大成了整体。如果不是误解，而是事实的话，就更加证明了深刻的小说存在的必要性。我非常尊敬那些思想精深且忠诚于自我表达的写作者。

记 者：您在获奖后接受采访时谈到，写作是一条平稳的河流，获奖则是一道瀑布。这道“瀑布”会对“河流”产生何种影响？

罗伟章：这种影响可能是正向的，会为河流增添动势、注入活力。但如果不能正确对待，也有可能会让河流断航。所以，作为写作者，任何时候都要回答好“我为什么写作”这个问题，要时刻检视自己的回答和写作实践是否配得上文学本身。

记 者：您接下来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？

罗伟章：前些日子我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，名叫《四千里》，表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，几位教师出于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，带着用于教学、科研和推广的千余只进口动物，跨越五省，行程四千里，从南京走到重庆的故事，是一个“另类西迁”的故事。写这部小说耗费了我不少心力，接下来写什么，暂时还没有计划，可能还是会围绕知识分子题材，再写一两部作品。

■短 评

## 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文学故事

——评臧杰的《清气——宋遂良文学文献研究》

□孟繁华

《清气——宋遂良文学文献研究》，是臧杰新近出版的一本专著。宋遂良先生是新时期文坛颇具影响的文学评论家、研究者和教育家。他对文学事业的挚爱，对当代文学创作整体状况的熟悉，特别是对年轻作家和评论家的提携，都广为业界称道。其本人更是受到青年作家、评论家由衷的爱戴。他率真的性格、青春不老性情，以及百折不挠、对生活永远兴致盎然、热泪盈眶的满腔热忱，铸就了他魅力无限的人格底色。见到宋遂良先生，顿生如沐春风之感，恰如朝霞缓缓铺开，漫彻云天。

臧杰是宋遂良先生的学生。他对宋先生的了解、熟悉和追随感，融化在书中的每一行文字中。在“自序”中他饱含深情地说：“伴随着多年的交往与了解，伴随着对先生文献的爬梳与解读，在先生身上既看到了‘公共性’，也看到了‘典型性’。这也是我以‘一身清气，两肩道义，三尺讲台，四海文章’来形容先生的因由。”这既是对业师的一种评价，也是编撰这部著作的缘故。当然，除了作者的情感因素外，我更感兴趣的臧杰描摹和讲述学人的方法。方法不仅体现了作者的专业素养，为进一步讨论问题奠定了基础，也为探索对象和问题建立了“通约关系”。在我看来，书中既有对宋先生整体性的评价，也有对其文学活动和日常生活的记录和呈现。特别是那些具体的专业活动和生活场景的展现，生动地展现了宋先生作为“个人”的传奇一生。

对一个学者和老师生平的书写，难的不是总体性的评价，而是写他日常生活中的“碎片”和能够表现他个性性格的细节。当然，建构一个评价人物的总体性框架并不容易，但这个“总体性”一旦时过境迁，更容易被改写或颠覆。而那些碎片散落于生活的各个场景，因其真实性而永存。更重要的是，恰恰是这些生活的“碎片”，连缀起来构成的历史不仅具有隐喻性，更因其真实性而无可辩驳。

“自序”和“引言”，是具有“印象记”和“概述”性质的文章。作为学生和策展人的臧杰，是以向老师“致敬”的姿态编撰这部著作的。他明确地讲这本书是“献给老师和他经历的时代”，任何重要

的人物都与历史相关。不仅是讲述对象参与了历史建构，同时历史或时代也塑造了笔下的人物。引言“未竟之书”，更是明确地讲述了学人和时代的关系。自宋先生1979年重新开始从事当代文学评论起，回溯宋先生在他的时代的“幸与不幸”，那份“痛与爱”有鲜明的时代痕迹。除了与历史相关的部分，更有个人的情感遭遇。个人情感与时代如此密切交织的遭际，是后来者难以想象的，这也是时代人 having 如此强烈的家国情怀的重要原因。“引言”通过无数丰富翔实的细节，叙述了宋遂良先生的生平经历。从泰安一中调入山东师范大学，是他命运的重要转折。“自序”和“引言”中对宋遂良先生生涯和文学贡献的评价和分析，既有时代的风云际会，也有个人的独特声音。音乐中的“大合唱”，不允许突出个人的声音，这是合唱艺术的要求；而文学批评不是大合唱，它必须有个人独特的声音。这个独特性，就是批评家的个性，也就是创造性。

我更感动的，是这样一些讲述：“进入晚境，宋遂良更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，他沉醉于其间的青春与活力。有一年，他曾因去追赶一队年轻人还受了批评，有文章以《是谁在保护学生？》为题对他加以质询……在他眼里，总有一个不息的青春中国。”另一方面，书中记录了宋遂良与老舍、田仲济、沈从文等文学名家的通信，西山读书班盛衰的时代风云以及宋遂良的日记等。这些碎片式的记忆看似无关宏旨，但是，历史就是隐含在这些碎片中。臧杰称得上是本雅明意义上的“历史拾荒者”。他打捞的历史碎片，不在主流叙事之中，但这些碎片却更真实地传递出那个时代轰然作响的历史回声。这显然是一种更值得重视的历史叙事方式。这些特点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臧杰关于历史讲述和叙事学的修养。因此，《清气——宋遂良文学文献研究》既可以看作是讲述学人经历和文学贡献的编年史著作，同时，也可以看作是讲述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文学故事。就历史讲述的方式而言，臧杰的尝试和贡献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。

（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）

相对于“屋檐”，“门”就更具有象征性，打开、关闭、半开半闭……都构成象征。当一扇门越来越难被推开，甚至根本推不开，某一片空间就被隔绝，整体性就会遭到破坏甚至瓦解。对个人是如此，对一个地区、一个国家乃至更广大的世界，也是如此。但同时，“门”又是生活化的，能产生具象化的感知，因为能感知，所以能理解。

记 者：您的作品涉及的体裁非常广泛，既有数量丰富的长、中、短篇小说，也有散文和非虚构。您有特别钟爱的某种体裁吗？是什么推动您不断去尝试新的文体？

罗伟章：选择不同的文体，有时是根据题材，有时是根据心情。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写散文，写散文的时刻是

自己有那么多的“不知道”。它们像一堵堵墙，把你隔绝出来，而你不但要把墙打开，还要融入进去，既要能感同身受，又要有审视之眼。说到这里，我真想自夸一下，那本书写得苦，也写得好。或许正是因为先苦过，所以才能真正写好。但要说我钟爱的体裁，还是小说，尤其是中长篇。

记 者：从字数和结构方式来看，中篇小说都是一种相对特殊的文体形式。您有什么可供分享的创作经验吗？在您看来，优秀的小说应该具备哪些特质？

罗伟章：我的中篇小说确实写得不少，但一时要说“经验”，又觉得哑口无言。不过你的话倒是让我想起自己最初写中篇小说的时候，《我们的成长》《奸细》《我们的路》《大嫂谣》，等等，都是凭

## 散文批评也可以是及物的

——评吴佳骏随笔集《散文家们》

□李向丽

在当代文学批评面临日益体制化、术语化危机的今天，吴佳骏的《散文家们》提供了一种难得的批评姿态。它既有批评家的锐度，又不失散文家的体温。这本耗时八年、以“编前语”为底本扩充而成的批评随笔集，看似散漫随性，实则暗含着一條清晰的线索：作者试图在散文写作的“可教”与“不可教”之间，找到一个可以言说的中间地带。

书中多次提及一个判断：好散文是“活”出来的，不是“写”出来的。这句话看似简单，却触及散文文体的本体论问题。吴佳骏认为，散文的根基不在修辞术，而在写作者对生存的切身感知。一个未曾真正“活过”的人，写不出有分量的散文。这不是鼓吹某种苦难崇拜，而是在强

调：散文需要写作者具备将生命经验转化为文本经验的能力——这中间隔着的不只是技巧，更是一种精神转化的功夫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吴佳骏并未因此轻视形式。他推崇的“有痛感和生命意识”的散文，同时也强调“节制”与“留白”的艺术。好的散文是“写到不能再写为止”，而非“写到无话可说”。这里暗含着一个辩证关系：情感的真切需要形式的克制来承载，否则便有可能沦为滥情。

《散文家们》最动人的或许是吴佳骏面对前辈和同侪时那种“理解的同情”。他批评那些敷衍塞责的写作者时毫不留情，但对每一位认真对待散文的同行，又怀着深切的理解。他知道散文写作的艰难——不仅是技术上的艰难，更是保持精神诚实的艰难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这本书不仅是写给读者看的批评集，也是写给散文写作者的一封信：提醒他们，也提醒自己，散文这门手艺最珍贵的不是才气，而是持续不断地对自己保持诚实。

当然，这种以“精神品质”为核心的批评方式也有其限度。当它面对那些在形式实验上有激进追求的散文时，判断可能显得不够从容。吴佳骏似乎更信任那种“沉潜内敛”的散文美学，对更具后现代气质的碎片化、拼贴式散文，措辞中偶尔流露出保持距离的审慎态度。这或许不是缺憾，恰是一位批评家鲜明立场的体现。

《散文家们》的价值，不仅在于它为当代散文勾勒了一幅精神地图，更在于它示范了一种有温度的批评可能。在学术生产日益标准化的今天，作者正在提醒我们：批评也可以是及物的，有痛感的，贴着生命经验走的。这本书里没有“理论焦虑”，只有一位散文编辑兼散文家，用八年时间，一页一页地辨认着同行者的真伪。它是一面镜子，照出散文家们的精神底色；也是一盏灯，照亮散文写作中那些不可言说却又至关重要的东西。

（作者系北岳文艺出版社主题出版策划室主任）